

谢冕、洪子诚、叶橹、吕进、吴思敬、沈奇
陈仲义、罗振亚、王珂等著名诗学理论家撰文或演讲

现代汉诗精品文库

三十八位诗论家论现代汉诗

王珂·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三十八位诗论家 论现代汉诗

主 编：王 珂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八位诗论家论现代汉诗/王珂主编.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641-7485-9

I. ①三… II. ①王… III. ①诗歌评论—中
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1510 号

- ◎ 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 2017 年度规划重点项目
“当代诗论家论现代汉诗”(项目编号: DX201704)成果。

三十八位诗论家论现代汉诗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兴化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55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7485-9
定 价: 118.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现代汉诗精品文库

编委会名单

主任委员：王 珂

副主任委员：江建中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庆楚 朴南用(韩国) 李 玫

汪 政 张 娟 范 雪

於 露 郑政恒(中国香港)

傅天虹(中国澳门) 曾 心(泰国)

主 编 简 介

王珂：男，重庆人，文学博士，1966年生，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湖州师范学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1987年在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获得学士学位，1990年在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导师邹绛教授、吕进教授、方敬教授)，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导师童庆炳教授)，2004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完成博士后(导师吴思敬教授)。主要从事新诗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出版专著8部：《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作》(61万字，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21万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新诗诗体生成史论》(58万字，九州出版社，2007年)；《诗体学散论——中外诗体生成流变研究》(39万字，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42万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研究》(43万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新诗现代性建设研究》(55万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王珂学术会议诗学论文集 1994—2017》(66万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主编著作6部，主要有：《五十位理论家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55万字，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包容冰新诗评论集》(32万字，作家出版社，2014年)；《李吉华诗选》(25万字，团结出版社，2015年)；《小诗磨坊小诗精选》(26万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曾心小诗500首》(27万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二十三位诗论家论小诗》(22万字，泰国留中出版社，2017年)。参编(译)著作10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共出版发表诗作、译作、散文和学术文字约1000万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诗现实功能及现代性建设研究”(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研究”(2012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课题“新诗文体研究”(2002年)、福建省教育厅A类项目“新诗文体的特征和文体建设”(2005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诗诗体的历史考察与构建策略

研究”(2006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汉语诗歌诗体语体意象功能综合研究”(2012年)、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全球新诗文体生态调查及新诗现代性建设研究”(2015年)、江苏省级智库东南大学道德发展智库项目“当前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伦理变迁与道德取向”(2016年)、东南大学2017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引导项目“全球汉语新诗文体的变异融通调查、研究和数据库建设”(2017年)、教育部省级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百年新诗体建设研究”(2002年)和“新诗功能学”(2015年)等。参与“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199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发展与文学语言的演变”(2016年)等。获得福建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

序 言

新诗现代性建设的意义及策略

王 珂

中国的 20 世纪是革命、战争、运动、改革……此起彼伏的动荡时代,21 世纪是否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时代? 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是否有利于建设“和谐诗歌”——自由诗与格律诗并存、传统与现代共处的诗歌? 建设新诗是否首先应该完成新诗现代性建设? 新诗现代性建设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成为现代人,有利于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百年新诗的历史就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历史。新诗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文体,是与政治文化的现代性建设基本同步的先锋性文体。今日新诗与古诗以及不同时期的新诗比较,这种文体在功能、体裁、题材、技法,特别是在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方面都有较大变化,这种变化通常是“现代性变化”。这种变化有的有利于新诗的健康成长,有的却产生了负面作用。但不能用进化论的观念来肯定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价值,还需要有“现代性批评”。实际上从 30 年代开始,新诗就不再“全盘西化”,多次出现“反现代性”潮流,如“大跃进诗歌”及“新民歌运动”。甚至直到今天,不仅波德莱尔的阳光还没有普照到中国新诗的大地上,也没有建立起“现代语言”和“现代诗体”,更没有培养出“现代情感”和“现代精神”。

21 世纪的新诗现代性建设仍然要强调“新”,甚至要“与时俱进”地重视“当下性”,要充分利用“现代性的动力”。“现代性的动力首先是在一个拥有传统和固定信念的世界里开始动摇传统和信念的。它们在催生一种现代社会格局上是有帮助的。但它们仅仅有一次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它出现在所谓的世界舞台上之后两千年。在它们最初出现的时候,现代性的动力遇到了一种非常暧昧的接受。”^[1]21 世纪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强调的“新”与 20 世纪的“新”有本质差异。20 世纪的“新”是“标新立异”的“新”,是与“旧”极

[1] [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65 页。

端对抗的“新”，是为了“破坏”，而且是“只破不立”的“破坏”的“新”。所以 20 世纪新诗坛流行“弑父式写作”。21 世纪的“新”更多是为了“建设”的“新”，“新”既有“创新”的“新”，也有“推陈出新”的“新”，新与旧的关系更多是“和解”，甚至不能作好与坏的价值评判。“新的未必就是现代的”，“新诗”也不能与“现代诗”等同。新诗与旧诗是断裂的甚至对抗的，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做诗原则。新诗是在“诗体大解放”甚至“作诗如作文”的口号下，在“白话诗运动”甚至“新诗革命”的洪流中，在文化激进主义甚至政治激进主义的思潮中“意外”问世的。它丝毫没有对先前的诗歌进行再造，它只有现代性激进的一面。所以今日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强调现代性面孔的丰富性，一定要重视现代性的中庸甚至保守的一面。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培养现代中国人和建设现代中国作贡献。要把这种先锋性与世俗化、启蒙性和审美性并存的文体，真正建设成为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它可以分为新诗启蒙现代性建设和审美现代性建设，具体为一大问题、两大需要、三大功能、四大任务、五大建设、六大特质、七大类型、八大诗体、九大题材和十大关系。一大问题指生存问题。两大需要指人的生理需要与审美需要。三大功能指启蒙、抒情与治疗功能。四大任务指新诗要促进改革开放，记录现代生活，优美现代汉语和完美汉语诗歌。五大建设指新诗建设要有现代情感、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具体为：一、现代情感重视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的和谐。二、现代意识重视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融合。三、现代思维重视语言思维与图像思维的综合。四、现代文化强调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共处。五、现代政治追求宽松自由与节制法则的和解。六大特质指要重视新诗在新世纪的六大文体特质。具体为：一、在写什么上多变的情绪多于稳定的情感。二、在写作手法上叙述受到重视，但是诗的叙述是从主观世界，尤其是从感觉和感受出发，写的是所感所思；散文的叙述是从客观世界，尤其是从生相和物象出发，写的是所见所闻。三、在写作语言上平民化口语多于贵族性书面语，意象语言受到轻视，口语甚至方言受到重视。四、在诗的音乐性上诗的内在节奏大于诗的外在节奏，诗的音乐性减弱。五、在诗的结构形式上诗的视觉结构大于听觉结构，诗的排列形式重于诗的音乐形式。六、在写诗的思维方式上图像思维受到重视，语言思维受到轻视。七大类型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八大诗体指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

和跨界诗。九大题材指校园诗、城市诗、乡土诗、生态诗、旅游诗、爱情诗、打油诗、哲理诗、政治诗。十大关系指新诗现代性建设分别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性别、年龄、地域、民族的关系。

新诗现代性建设要突出的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新诗,尤其是今日新诗必须关注“生存”,尤其是人的生存问题。诗不仅要反映和记录现代人,准确点说是当代人的生存境遇,还要给社会和人提供实用的生存帮助。前者可以通过诗的启蒙,甚至宣传功能来完成。后者可以通过诗的抒情功能,甚至治疗功能来实现。阿德勒在《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一书中把一切人类问题归为三大问题: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认为三者构成了生命的三项任务。他指出:任何人的生活都受限于三个约束,而且他必须考虑到这三个约束。它们构成了他的现实,因为他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源于这三个约束。由于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缠绕他,他因此总是被迫回答处理这些问题。个体心理学发现,一切人类问题均可主要归为三类: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今日新诗还没有获得可以“高空翱翔”的生态,它只能“低空滑行”,尤其在“写什么”上,很有必要强调“接地气”,新诗现代性建设需要重视“接地气”,要充分肯定现代性的世俗性,要满足人的低级需要——生理需要和高级需要——审美需要,关注现代人的生物性情感、心理性情感和审美性情感,尤其不能排斥宣泄式情感写作和纯形式美感写作,特别是本能写作和快感写作。通常情况下,人的生物性情感产生情色诗,心理性情感产生抒情诗,审美性情感产生图像诗。两种需要既是人的各种需要的两极,也可以互相转换。性问题既是生理问题也是心理问题,人们追求性与爱实质上是在追求肉体的本能需要和情感的甚至灵魂的精神需要,前者如马斯洛所言的如食物、水一样的性的需要,后者如他所言的爱与归宿的需要。过度的性压抑是近年精神性疾病,如忧郁症流行的一大原因。因此可以通过写作或欣赏爱情诗和色情诗来满足生理需要,来释放压抑,缓和焦虑,增加自信。在实际爱情诗的写作过程中,本能性的“性爱”往往会升华为精神性的“情爱”,低级情感会向高级情感转化,以追求抒情的“快感”为目的的本能写作往往变成追求诗意的“美感”的艺术写作。前者可以满足马斯洛总结的人的低级需要——对性爱和归宿的需要;后者能够满足人的高级需要——对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特别是可以呈现出人的“审美本能”。把爱情诗,甚至色情诗写得很美、很有艺术性的诗人,大多具有加登纳所言的较好的“语言智能”和马斯洛所说的较强烈的“审美需要”。一些优秀诗作可以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和审美需要,让读者读后既有“美感”,也

有“快感”。波德莱尔给“现代诗歌”下的定义是：“现代诗歌同时兼有绘画、音乐、雕塑、装饰艺术、嘲世哲学和分析精神的特点，不管修饰得多么得体，多么巧妙，它总是明显地带有取之于各种不同的艺术的微妙之处。”^[1]这样的“现代诗歌”能够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和审美需要，阿多诺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诗能够把社会压制自然与人性的复杂真实反映出来：“当编制性的社会愈超越个人，Lyric 的艺术的情况愈游移不定。波特莱尔是第一个关注这个现象的诗人，……通过一种自身绝对客观性的建立，这种诗无视现行社会狭窄的、受限历史性的、意识形态片面的所谓客观性的传达方式……而设法保持一种活泼泼、未变形、未玷污的诗。”^[2]新诗的现代性建设需要重视的正是这种“活泼泼、未变形、未玷污的诗”。这种诗能够让入体会到“感性”和“感受性”，更能让人欣赏到“艺术”和“美学”。

新诗的“现代性”建设必须要重视的一大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两大需要是人的生理需要和审美需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自然就产生了三大功能：治疗功能、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三大功能更多涉及新诗题材及内容，与语言形式及文体也有关系。文体本身具有政治革命的潜能，新诗的诗体就具有政治性，百年新诗的历史是格律诗体与自由诗体的对抗史，也是现代文体与传统文体的对抗史。在“五四”时期、抗战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新诗都是一种政治性文体，启蒙功能远远大于其他功能。今日中国诗坛，既需要纯艺术派的诗歌，更需要人生的艺术派的“人的诗歌”。把启蒙功能放在第三位，并非它不重要。高度严肃性是新诗重要的文体特色，启蒙功能曾是新诗最重要的功能。“社会化写作”长期是“主旋律写作”，不同时期的诗人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创作了大量黄钟大吕式的作品，如“五四诗歌”“抗战诗歌”和“改革诗歌”，都激励了大众的斗志。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文化大转型时期，诗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变：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政治抒情诗，80年代中期流行先锋诗；90年代流行个人化写作；21世纪流行平民化写作。在改革开放30年里流行的热门词汇是“使命意识”“生命意识”“身体意识”和“底层意识”。这些词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诗应该是实在的、正经的生活。也可以把当代新诗的功能归纳为四点：抒情功能、审美功能、启蒙功能和治疗功能。在

[1] [法]波德莱尔：《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2] [美]叶维廉：《散文诗——为“单面人”而设的诗的引桥》，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不同时期侧重不同的功能,80年代重视启蒙功能,90年代重视抒情功能,21世纪初重视审美功能,近年重视治疗功能。因为审美功能更多属于诗的形式而非内容上的,属于贵族的而非平民的范畴,所以在生存问题仍然是国人的最大问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的生理需要比审美需要更重要的特殊时期,当前新诗现代性建设中的功能建设应该突出治疗功能、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新诗的现代性建设要重视三大功能建设,并不排除其他功能,尤其是由人基本的审美需要导致的审美功能的建设。在生活方式都可以多元的社会,新诗的功能也应该是多元的,作为一种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抒情性文体,新诗应该如马尔库塞所言,有义务“解放主观性与客观性之一切范围内的感觉、想象和理智”^[1]。解放的结果是不仅可以让人获得心灵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还可以让人获得心理的安慰与生理的宣泄。前者达到的效果就是启蒙,后者达到的效果就是抒情,两者结合就可以治病。

中国教育的现代性与新诗的现代性也有点异曲同工,都不是一种极端的,尤其是富有后现代特质的现代性,都会兼顾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甚至重视传统和规则,不极端强调自由与主体。写现代诗的最大目的就是培养现代人,首先应该通过写诗,使诗人自己成为现代人。把促进改革开放置于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四大任务之首,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既是为了强调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中国诗歌的“诗教”和中国文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品格,更是为了突出中国新诗的先锋性及政治性的文体特征和中国新诗诗人的浪漫性及革命性的现代品质。虽然“完美汉语诗歌”被放在四大任务之尾,但是并非“本末倒置”地让“现代中国人”大于“现代中国诗人”,“写好诗”和“当好诗人”仍然是四大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即要以诗人的身份,通过写出好诗来促进改革开放和优美现代汉语,来完美汉语诗歌。当下的中国诗人也必须关注这三类问题,既仰望星空又直视大地。这三类问题集中起来即是“生存问题”,今天已经不是诗歌的轰动时代,对绝大多数诗人,尤其是普通诗人,新诗现代性建设中的第二大任务——记录现代生活才是首要和直接的任务。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政治抒情诗流行的时代,90年代初是哲理抒情诗流行的时代,那么今天应该是生活抒情诗流行的时代。对记录现代生活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新诗的写实传统和抒情传统的重视。

[1] [美]赫·马尔库塞:《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9页。

“‘应该绝对地现代’。”^[1]这是1870年法国诗人兰波发出的声音。中国新诗也“应该绝对地现代”，强调现代性是新诗的本质特性。近百年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如何现代化，中国人如何成为现代人的历史。百年新诗的历史就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历史。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新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始终发挥着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文体不能取代的启蒙作用。所以百年新诗的最大成就，不是诗歌上的成就，也不是语言上的成就，而是政治上的成就，它以既参与政治又逃离政治的方式，前者如直接干预政治生活的政治抒情诗，后者如追求唯美写作和纯形式快感的审美图像诗，参与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设，甚至可以说是推进了中国的民主进程，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现代人。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建设时期，新诗更应该承担起培养现代人的历史重任，尤其是造就健康的和健全的现代人的重任。让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少一些商业时代的病态人格，多一些文化时代的乐观向上的健康精神。今日中国人应该是有现代情感、现代意识和现代思维的现代人，今日中国社会应该是有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的现代社会，今日中国诗歌应该是有现代语体和现代诗体的现代诗歌。在中国，写现代诗难，做现代人更难。新诗现代性建设要致力于现代文化建设，这种文化要强调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共处。尤其是在肯定自由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时，也要考虑到它的消极因素。如它会过分强调自然情感和个人意识，忽视社会情感和群体意识。现代诗人应该是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人，是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人，是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人。所以现代诗人的现代情感要重视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的和谐。诗人既有自然人的情感，更有社会人的情感。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一大任务是培养现代人的现代意识，要重视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融合。现代自由意识是现代意识的重要内容，这种自由不是极端的自由。自由导致了新诗的先锋性，如果说自由是新诗最可贵的品质，那么世俗性是新诗现代性的一大特点。古代汉诗是贵族的文学，现代汉诗是平民的诗歌。百年新诗的历史可以说是汉语诗歌世俗化的历史。白话诗运动的领袖们的诗歌理想就是把汉语诗歌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让它在贫民窟里如鱼得水。正是世俗性导致了新诗的主体性和本体性，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和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否认诗与文的文体界限，而是想借此降低写诗的难度，让普通人获得写诗的权力。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一大

[1] [美]R. S. 弗内斯：《表现主义》，艾晓明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目的是建设起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这种现代政治应该有宽松而有节制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才能让公民享受到做人的自由,也可以让他们乐于遵守社会的法则。这是由新诗的先锋性甚至革命性的文体性质决定的。在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战争、改革此起彼伏,动荡的生态强化了新诗的政治功能,形成了以自由诗为霸权诗体的动态诗体。20 世纪社会具有过多的政治革命潜能,20 世纪诗人具有过多的革命激情,20 世纪新诗也具有过多的文体革命潜能。20 世纪初“文学革命”的先锋——“白话诗运动”打造出的新诗是一种意识形态性较浓的政治性抒情文体。在 21 世纪之交,尽管流行个人化写作,大陆新诗文体的政治性并没有减弱,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可以简要地把 30 年来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新诗写作分为十大类型,并用简洁的政治话语描述。一、浪漫主义写作:浪漫即革命。二、现代及后现代写作:先锋即革命。三、低俗写作:身体即政治。四、精致写作:审美即政治。五、口语诗写作:语言即政治。六、个人化写作:艺术自由即政治自由。七、底层写作:生存诉求即政治诉求。八、网络诗歌写作:媒体开放即政治开放。九、诗歌群落运动:艺术多元化即政治多元化。十、诗歌研究论争:学术即政治。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做好六大建设:现代情感、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文化、现代政治和现代文体,尤其是新诗的启蒙现代性建设要建设好前五种。其中有的应该激进一点,如人的现代意识和社会的现代文化的建设,但是必须坚持这样的建设总方针:应该绝对地现代,但是不能极端地现代。

新诗现代性建设既要考虑新诗的启蒙现代性建设,回答“新诗何为”;也要考虑新诗的审美性建设,回答“何为新诗”。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才能回答“如何新诗,怎样现代”这一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分别考察今日新诗文体六大特质,不难发现新诗现代性建设最应该考虑的是第一大特质——新诗在写什么上多变的情绪多于稳定的情感的巨变。必须意识到今非昔比,新诗已经“旧貌换新颜”,又“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新诗的现代性建设只能采取“守常应变”的原则。将“诗是抒写感情的语言艺术”改为“诗是抒发情绪的语言艺术”,仍然离不了一个“情”字。古代汉诗在诗的功能巨变方面是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现代汉诗的功能巨变是从“诗写感情(情感)”到“诗写感觉(情绪)”。今日新诗更多的是情绪的艺术而不是情感的艺术。即在写什么上,新诗出现了情绪取代情感这一“题材巨变”。现代人写现代诗越来越不重视“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直抒胸臆的写作方式越来越受

到重视,推崇的是感情的放纵和个性的表现。今日新诗越来越是“情绪的直接的言语表现”。“快”成为新诗写作的一大特色——以最快(有感而发)的速度,最快(短小精干)的语言表达最快(转瞬即逝)的情绪。也可以用“短、平、快”来形容。这也是近年小诗流行的重要原因。新诗现代性建设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文体特质是叙述在新诗中越来越重要,甚至有取代抒情的趋势。新诗百年,前70年是抒情时代,叙述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创作手法甚至修辞手段,甚至被视为抒情的敌人。后30年,尤其是今天,是叙事与抒情共生的时代,甚至叙事有“喧宾夺主”之势,“拒绝抒情”成为近年诗坛的流行口号。今日新诗已经不像过去是纯抒情类文学,而是叙事的抒情类文学。诗应该是抒情文体,叙述、描写只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抒情的辅助性表达方式,可以形成新诗的“散文美”,还可以改变新诗的滥情与矫情,克服林以亮所言的新诗有高度的抒情性和严肃性的缺点。但是因为叙述的常常是现实中已有的事情,甚至原生态的东西,不需要作者的艺术加工,再加上这些叙事诗,采用的是不加提炼的原生态语言,写作难度大大降低,显示不出诗人是最具有语言智能的人。近年很多诗人已经缺乏这种诗人应该有的对文字的敏感性,口语诗甚至沦落为口水诗。这与诗人过分重视叙述,轻视抒情有关。因为诗人在写诗时很容易把诗需要的精炼叙述与散文需要的松散叙述混淆。偏爱叙事是今日新诗第二大文体特质,导致了新诗的第三大文体特质——平民化口语多于贵族性书面语,口语诗流行,意象诗受到极端的轻视。新诗现代性建设要考虑的第四大文体特质是诗的音乐性减弱,应该高度重视诗的内在节奏,适度轻视诗的外在节奏,但是要意识到今天已经不是朗诵诗时代,很多诗是用来默读的,新诗的音乐性就不重要了。随着文化的大普及,诗的专业性、知识性越来越重要,强调诗的音乐性的民间诗歌作为新诗诗体建设的资源也就没有过去那么重要,因此不能极端强调新诗的音乐性。今天新诗的主导诗体应该是“准定型诗体”而不是“定型诗体”,新诗的诗体建设不一定非要走“格律化之路”。不能通过建设重视格律的定型诗体来极端重视诗的音乐性,不能不顾现代汉语和当代人的生存特点,如现代汉语自由散漫,音乐性比古代汉语弱;当代人追求民主政治及多元生存方式,甚至生活在解构主义时代。新诗现代性建设需要考虑的第五个文体特质是新诗是视觉的艺术,诗的视觉结构大于听觉结构,诗的排列形式重于诗的音乐形式。诗的音乐美和建筑美是新诗最重要的两大形式美,百年来,新诗一直非常重视诗的视觉形式及排列方式。新诗表面音乐形式缺失造成的形式美的减少需要通过视觉形式的加强来

弥补。汉字的形象性、欣赏价值和汉语的模糊性、多义性以及汉诗的图像诗传统都有利于新诗的形体建设,但是不能过分强调新诗是视觉的艺术。新诗重视诗的视觉形式,强调诗的建筑美或排列美,甚至出现了图像诗的创作热潮,与新诗的第六大特质有关,即今日新诗在写诗的思维方式上,图像思维受到重视,语言思维受到轻视。

“现实主义”,甚至“浪漫主义”在今日中国,尤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应该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重要类型,应该得到高度重视。同时也要意识到新诗现代性建设不能过分重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必须更加重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在现代诗歌信息相对闭塞,现代诗歌教育相对落后的基层地区,一些诗人,甚至一些成名诗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完成由现实主义诗人到现代主义诗人的角色大转化,尤其要完成在写作方法及写作技法上的技巧大转型。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考察了“现代”的概念和“新”的概念,认为它们在20世纪前期被等同起来。所以他总结出现代性有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这种将“现代”与“新”等同的现象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十分普遍。以文学界为例,“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新诗”与“现代诗”几乎是等同的。但是今日中国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却不能照搬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观点,认为今日新诗的现代性只有他所说的“五副面孔”。他也不完全肯定现代性就只有这“五副面孔”,他在本书的序言中认为现代的不明确性游移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和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之间,甚至认为“现代化”可能是现代性的“第六副面孔”。他甚至提出现代性可以有许多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没有一副面孔。所以今天的新诗现代性建设也应该适度强调“中国特色”,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初级阶段”特色和“幅员辽阔”特色。应该把新诗的现代性区分为“七副面孔”或七大类型,分别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七大类型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互相转化,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性转移”而被“中国化重构”的境况之中。因此今日新诗现代性建设的重大任务是要务实地完成现实主义诗歌向现代主义诗歌的改造,这种改造既要有“接地气”的现实,更要有“望天空”的理想,最重要的是要强调“低空滑行”。正是因为应该把新形势下或者“新常态”下的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纳入今日新诗现代性的“七大类型”之中,才有必要把新诗现代性建设分为启

蒙现代性建设和审美现代性建设两大类,虽然两者有交叉,但是前者更关注新诗题材的现代性建设,后者更重视新诗体裁的现代性建设。既重视文体狂欢又重视文体自律是新诗文体建设的基本方针。新诗文体现代性建设的总方针应该是高度重视题材的“现代”和适度坚持体裁的“保守”,前者重视以“现代精神”及“现代意识”为代表的启蒙现代性建设,后者重视以“诗家语”及“准定型诗体”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建设。

诗的文体主要由诗体呈现,没有文体就没有文学,没有诗体就没有诗。不能把诗体只归入诗的形式(怎么写)范畴,它也属于诗的内容(写什么)范畴,更属于诗的技巧(如何写好)范畴。“诗体,即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1]所以应该从如何写好(技巧)、怎么写(形式)和写什么(内容)三个方面来完成新诗诗体现代性建设,一定要坚持技巧大于形式,形式大于内容的原则。新诗诗体现代性建设不仅要有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旧观念,还要有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形式就是内容,甚至形式大于内容的新观念。今天的新诗诗体现代性建设仍然要强调诗的内容的平民化和形式的贵族化,要致力于四大类诗体的建设。一、改建百年新诗已有一定建设基础的旧诗体,如新格律诗体、自由诗体、十四行诗体、小诗体、长诗体、图像诗体、朗诵诗体等。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借鉴中外诗体建设新诗体,如借鉴古代汉诗的优秀诗体分别建设赋体新诗、古体新诗、近体新诗、词体新诗、曲体新诗,可以称为古诗体新诗;借鉴中国民歌的优秀诗体如信天游、花儿等建设民歌体新诗;借鉴外国优秀诗体,如具象诗、俳句、萨福体、十四行诗等建设中国式外国诗体新诗,可以称为西体新诗或外国体新诗。三、利用科技创建多媒体新诗,如博客诗、微博诗、微信诗、QQ诗、手机诗、网络诗。四、利用其他艺术进行跨界写作,创建艺术体新诗,如以歌词为代表的音乐诗,以图案诗为代表的美术诗等。新诗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八大诗体: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和跨界诗,前四种是新诗的“传统”诗体,已有一定的建设基础,需要“重建”或“改建”;后三种,尤其是后两种是新诗的现代诗体,需要“创建”或“新建”。自由诗现代性建设要重视诗体、意象、语言等诗的元素及叙述、描写等诗的技术上的现代性建设。自由诗现代性建设要适当重视诗的音乐性,高度重视诗的排列,格律诗的诗体建设主要是音乐形式的建设,自由诗的形式建设主要是视觉形式的建设,即格律诗要更重视诗的

[1] 王珂:《诗体学散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2页。

音乐美,自由诗要更重视诗的排列美。格律诗要重视韵律,尤其是外在韵律;自由诗要重视旋律,尤其是内在旋律。自由诗现代性建设还要重视诗的基本要素——诗的意象,和写诗的基本技术——诗的叙述。意象传统不仅是古代诗歌的传统,也是现代诗歌的重要技巧。古代汉诗讲究“含蓄”,所以“诗出侧面”“无理而妙”是古代汉诗的常规技巧。格律诗现代性建设的两大任务是:一、完善新诗史上一直在建设的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体,又称新格律诗和格律体新诗。二、借用古代汉诗已有的定型诗体——古代格律诗体,创建古诗体新诗,具体为赋体新诗、格律诗体新诗和词体新诗等。“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今日格律诗现代性建设应该采用的基本原则。小诗一开始就呈现出强烈的现代品质,写作小诗是现代人的—种日常化生存方式。如果说自由诗的诗体自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诗体呈现,小诗诗体中准定型诗体的在限制中有自由的诗体形式,可以呈现出现代人推崇的循序感和自由欲有机结合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政治追求的宽松而有节制的上层建筑的生存方式。这正是小诗现代性建设在文体学意义之外的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与小诗相比,长诗现代性建设更偏向于诗体的限制。近年中年诗人写的长诗,尤其是革命题材或主旋律题材的长诗,大多是“颂歌”,缺乏“诗人的主体性”,叙事成分太多,缺乏“诗的抒情性”。所以长诗现代性建设要加强诗人的主体性建设和诗的抒情性建设。散文诗现代性建设与长诗现代性建设相反,偏向于诗体的自由甚至解放,仍要确定出散文诗的基本要素:丰富的想象、优美的语言、新颖的意象、跳跃的情节、生动的情景、细致的抒情、简洁的叙事、准确的描写、灵活的句式和精致的结构等。大陆散文诗现代性建设要改变今日流行的散文诗比诗好写的观念,要接受中国台湾诗界的观念——散文诗不但是诗,而且是诗中的精品甚至极品,只有优秀诗人才敢写散文诗。图像诗更是一种在现代诗歌运动中产生的现代诗体,是人的创新精神及喜新厌旧的本性、文体的革命潜能及质文代变的天性和社会的进化意识及与时俱进的本性结合的产物,也是人的语言思维与图像思维在现代社会完美结合的结果。图像诗现代性建设不能过分推崇图像思维在诗的创作中的作用和图像在诗中的价值。尽管网络诗流行,却极少有人把网络诗当成新诗的一种诗体来进行现代性建设,尤其是没有诗人如百年前未来主义诗人重视人与机器那样,探讨科技与诗歌、机器与诗人在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这是今日网络诗现代性建设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还要针对不同的传播方式来构建诗体,如微信与微博、电脑与手机传播信息的方式不同,微信诗与微博诗、电脑诗和手